

《围城》为何删去对冒广生父子的嘲讽

□苏魏

《围城》是钱锺书的名著。这部小说，以语言幽默刻薄名世。整部著作，刻薄得仅有唐晓芙、董氏父子“涉险过关”——未遭钱先生口诛笔伐。董氏父子即董沂孙、董斜川，两人原型正是明末如皋名人冒辟疆的族裔冒广生、冒效鲁父子。事实上，钱锺书最初在《围城》中讥讽过冒广生。何故讥讽，何故删订？不妨从钱锺书与冒氏父子交游谈起。



冒广生、冒效鲁父子



相识考述

学林人士多有共识：1938年，钱锺书、冒效鲁结识于归国轮船。日后，钱锺书经冒效鲁介绍，结识冒广生。卞孝萱先生写过：“钱锺书因冒效鲁而认识冒广生。”李洪岩《钱锺书与冒效鲁》也说：“回国后，冒效鲁介绍钱锺书结识疚斋先生（冒广生）老夫子，相谈甚欢。”此说“始作俑者”正是钱先生本人。钱锺书晚年为《谈艺录》补订时，追忆：游学欧洲，都抛旧业。归舶邂逅冒君景璠（冒效鲁），因以晋见其尊人疚斋先生，并获读所著《后山诗天社注补笺》。

钱锺书暮年记忆“有误”，他此前已经读过那本《后山诗天社注补笺》。此书其实就是“冒氏丛书”中的《后山诗注补笺》。念及陈后山（徐州人）为苏北同乡，冒广生为《后山诗注》补笺。1936年，《后山诗注补笺》已由商务印书馆发行。钱锺书、冒效鲁归国途中，钱先生吟有《孝鲁以出处垂询，率陈鄙见，荆公所谓无知猿鹤也》（刊于1939年第5期《国师季刊》），后更名《答叔子》，录入《槐聚诗集》。或刊或集，诗后皆注：方读次翁《后山

诗笺》。言之凿凿，不容置疑。

钱锺书结识、关注冒广生，始于陈衍，倒非冒效鲁。《冒鹤亭先生年谱》记载，1935年5月，冒广生赴苏州，为祝陈石遗（陈衍）八十生日，兼商谈赴粤日程，面晤钱锺书。钱锺书于《石语》中有所呼应：寿宴散席，陈衍欣然有曰：“予将西渡，余欲南归……”年轻的李先生将西赴英伦，年高的陈先生将南下广东，两人再见，后会无期。早在1932年，冒广生诗作已给钱锺书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也在《石语》中有所记述，二十一年阴历除夕（1932年2月5日），陈衍奖掖后生，视钱锺书为知己，邀其守岁，促膝长谈，高谈阔论，点评诗坛。当日交心，陈衍直言不讳地点评冒广生诗作。

陈衍谈诗论友，冒效鲁情谊深厚，钱锺书才会创作和删订“董沂孙”的人物形象。

修订始末

1946年，《围城》初现于《文艺复兴》，关于董沂孙的描写，前后四句话：“董斜川的父亲董沂孙是个老名士，虽在民国做官，而不忘前清。生平不讲

好名，因为他实在好利。他最心爱斜川，认为他能传家学。他不叫斜川好好的念书，只等他在北京陆军大学混毕业，揩老面子，为儿子送条子，谋差使。”四句话，皆可索隐，皆有所指。

先前，陈衍已在《石遗室诗话》中点评冒广生：冒鹤亭早慧有声，长而好名特甚。余见其所刊《五周先生集后跋》及《外家纪闻》，文笔步趋古人……见君诗，佳句甚多，率笔者亦有时。

《石遗室诗话》《石语》皆言冒广生好名，《围城》中董沂孙为“老名士”。冒广生为清末举人，像其先人冒襄，可谓遗民、遗老，因此眷念前朝。至于“生平不讲好名”，因为他实在好利，应为反话，即钱先生欲盖弥彰的手法。1938年，钱先生阅览《后山诗注补笺》就有心得：每用“敢”字，作“不敢”解。只是他在《答叔子》（笔者注：叔子即冒效鲁）中所谓“此意硁硁敢苟同”，实为“不敢苟同”。旧诗可反用，何况小说乎？钱锺书是借《围城》讽刺冒广生不讲好名，实际好名。何处扯出“利”呢？源于陈衍逝后，冒广生给予评骘：我好名君好利。冒陈恩怨，由来已久，后文再释。

后两句董沂孙的描写，前句写实，后句已含射影捏造。“他（董沂孙）最心爱斜川，认为他能传家学。”冒广生在《作诗一首示景璠》中写道：“我有五男儿，璠也得吾笔。书求南北通，字解形声别。”足见冒效鲁克绍箕裘，传承家学，深得父亲喜爱。他（董沂孙）不叫斜川好好的念书，只等他在北京陆军大学混毕业，揩老面子，为儿子送条子，谋差使。”此句多为戏言反话。如同钱基博严格管教钱锺书，冒广生盼望冒效鲁好好学诗，作有《作诗一首示景璠》：“近来颇作诗，我当示棒喝。”

“混毕业、揩面子、送条子、谋差使”明显丑化冒氏父子的形象。冒效鲁学富五车、书通二西，否则不为钱先生尊为诗友。《知非杂记》记载，1930年，冒效鲁全校考试名列第一，从北京俄文专修馆（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政法学院）毕业。傅增湘（并非冒广生）为他写信（送条子）给东北元老袁

金铠。还有冒广生的好友胡汉民，两次为冒效鲁写过条子，助其成为驻苏大使随员。无论在东北，还是于苏联，冒效鲁都很胜任工作。

自《文艺复兴》刊出后，1947年《围城》初版时，钱先生便删去有关董沂孙的后三句，仅留首句。此举两得：规避读者对于冒广生、陈衍之间恩怨的褒贬，钱锺书可不负两位知己；回避老知己陈衍好利的形象，维系新知己冒效鲁的友谊。

冒陈交恶

论及《围城》初始丑化冒氏父子，不得不回溯冒广生、陈衍交恶史。其间，钱锺书推波助澜。《石语》留痕，那夜谈诗，陈衍在向晚辈钱锺书推心置腹：交好中远如严几道、林琴南，近如冒鹤亭，皆不免空疏之讥……鹤亭天资敏捷，而早年便专心并力作名士，未能向学用功。前日为《胡展堂诗集》求序，作书与余，力称胡诗之佳，有云：“公读其诗，当喜心翻倒也。”夫“喜心翻倒”出杜诗“喜心翻倒极，呜咽泪沾巾”，乃喜极悲来之意，鹤亭误认为“喜极拜倒”，岂老夫膝如此易屈邪？

陈衍全盘否定冒广生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天资用于求名，未用于学业，以至于学识固陋，误用“喜心翻倒”。钱先生为此写下按语：《小仓山房尺牍·答相国·与书巢》二札皆有此语，是随园已误用矣。

此按追根溯源，讹误起源指向清人袁枚，似为冒广生解脱，实为陈衍佐证。有趣的是，冒效鲁竟然获悉按语。《石语》中还有钱先生两则关键按语——孝鲁见此，语予云：原函作“喜心倒极”；鹤亭悔石遇诗，遂有“我好名君好利”之语，盖反唇也。

《石语》为钱锺书所藏，他人难得一见。冒效鲁“见此”，应为钱锺书出示。陈衍批语，经钱锺书、冒效鲁，传入冒广生耳中。陈衍爱财，又是事实。因此陈衍离世，那句“我好名君好利”乃冒广生“自毁式”反唇，给钱锺书也留下印象，大概也成为他于《围城》中描写董沂孙的“引子”。

掘港京剧艺术家王鸿寿

□程太和

王鸿寿

（1850—1925），艺名“三麻子”，如东掘港西郊茶庵殿人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。

王鸿寿父亲为通州水道运粮官员，家有昆、徽两副戏班，自幼聪颖过人，受其熏陶，王鸿寿与京剧渊源颇深。清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父亲因被诬陷而遭灭门之罪，仅王鸿寿一人逃出。他逃难到南京，加入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办的戏班学艺。1864年，太平军失败，他来到苏北里下河地区开始演出生涯，当时才14岁。这个过程中，里下河徽班也纷纷外出巡演。上海地方史料有记载，当时在上海八仙桥一带的荒地上，出现了三个草台剧场，都以竹篱、布幔搭起简易的剧场，演出者都是流浪江湖的徽班。后来，王鸿寿等也来到上海。他们的出色表演使得徽班的观赏性越来越强。相比之

下，昆曲和山西班、广东潮州班、浙江绍兴班就显得古奥艰深，晦涩难懂，于是它们逐渐没落。上海人爱看徽班的信息很快传开，使北京的徽班闻风而动。此时徽班进京已经七八十年，在京城文化的浸染之下，他们的艺术获得进步，今非昔比，报纸上说“沪人初见，好评如潮”。有演出商为他们打造专演剧场，票价加得很高。这就造成了两类人分别看两种徽班：有钱的上层人士看北京来的徽班，中下层观众看里下河来的徽班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，在《申报》刊登的戏剧演出广告启事上，首次以“京戏”二字指称北京来的徽班。从此，风格有所不同的两种徽班被逐渐分开了。

王鸿寿逐渐成为里下河徽班的标志性人物，他常用的唱腔里有老徽班里的“高拨子”和“吹腔”，这是“京班”里没有

的。王鸿寿还创造了介于老生和武生之间的“红生”行当，这个行当主要是演关公戏。关公出场由马童先出来翻一串跟斗以为引领，出场时身后竖一面方形“关”字大旗，这样的处理也是从王鸿寿开始的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关公戏，都是王鸿寿所创的南派演技，王鸿寿是南派京剧的奠基人之一。

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王鸿寿在上海小东门外升平轩戏园，以武生戏《武当山》、老生戏《九更天》享誉沪上，《申报》曾有专门报道。王鸿寿京剧艺术造诣极深，除演文武老生外，有时串花脸，亦串演小丑，融武生、架子花脸、做工老生于一炉，唱念做打俱精，无戏不工，尤其擅长演《古城会》《走麦城》《灞桥挑袍》《水淹七军》《过五关》等红生戏。王鸿寿在继承前辈演艺的基础上，大胆对关羽脸谱、唱腔、造型、身

段、服装和念白等诸方面进行改革，推陈出新，把关羽形象活现在舞台上，被京剧界誉为“活关公”，尊为红生鼻祖。京剧大师周信芳和京剧名家杨洪春（与王鸿寿同为如东掘港人）、林树森、刘奎官等先后都是王鸿寿的嫡传弟子。绘画大师刘海粟早年在上海，曾多次观看王鸿寿演出，盛赞他的关公戏：“王鸿寿演老生以古朴见遒劲，演红生为一代巨匠，叱咤风云，实至境。”

以画喻戏，还说“三麻子的戏，真大泼彩风情，每观演出，给人的艺术享受，在瞠目结舌之余，回味几十年”。

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秋，王鸿寿74岁时，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抱病登台演出《走麦城》。一招一式仍威严工整，神韵十足。

在散场后，人们才发现王鸿寿跨下骑马瘤进裂，鲜血浸透衣裤。从此，王鸿寿便卧床不起，于翌年1月24日与世长辞。

以一营之力阻击两团之敌

□李元冲

被我军各个击破，因而纷纷向四甲等大据点集合兵力。为消灭这些大据点的敌人，1948年8月，我军决定首先拿下海启公路上的重要通道麒麟镇，以切断敌人的东西往来。

麒麟镇据点工事坚固，四周还有高墙和护河，且离三厂、常乐等据点较近，敌人容易增援。我军经过多次侦察综合分析敌情，决定以分区八团为主攻部队，攻打麒麟镇，分区九团、东南警卫团、如东警卫团等设伏在海界河沿线及二匡镇等处，阻击从三厂、四甲和南通方向来增援的敌人。东南警卫团的任务是设伏于麒麟镇西北的海界河沿岸，防止四甲和南通方向的敌人前来增援。海界河沿岸设伏的重点是铁板洋桥（今属四甲镇惠才村境内），东南警卫团在那里放了战斗力最强的一营，作为守桥部队，阻击敌人过桥增援麒麟镇敌人。

顾老说，9月16日晚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后当即赶到铁板洋桥，先把铁桥板拆了，在铁板洋桥南侧不远处挖了工事，战士们有的埋伏在工事里，有的埋伏在附近的玉米田和高粱田里。他所在机枪班的十几挺机枪也分散开来，分别设伏在工事里和田野隐蔽处。顾成祖和其他

二位同志扛着一挺机枪设伏在一处群众的草房上。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铁板洋桥方向，专等敌人前来。

第二天拂晓，从四甲据点来增援麒麟镇的敌人赶到了铁板洋桥。我方原以为来增援的部队不会超过一个营，但实际来增援的部队是敌人的四三八团，人数在1000多人，和我方300多人相比，足足超过了3倍多。而且四三八团是敌人的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。面对强大的敌人，我方警卫团的战士严阵以待。这时敌人的先头部队首先来到了铁板洋桥，一看铁桥板已被拆除，怕桥南有埋伏，于是向桥南连发了几十发炮弹以探虚实，埋伏在桥南的我军一动不动。敌人认为没事了，不多一会儿敌人扛来了不少木板，开始铺设桥面，我军仍一动不动。不多一会儿敌人把桥板铺好了，首批人员踏上了桥面，我方营长仍未下达战斗命令。当敌人排着队刚过桥走到南桥堍时，一声号令，我军机枪、步枪一起开火，走在桥上的几十个敌人全被打下桥落水而死。敌人发现了我军的阵地，立即以强大和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开火，我军伤亡较大。敌人再一次组织冲桥行动，我军迅速组织机枪掩护，几个战士拿

着炸药包去炸桥板，桥板炸毁了，但战士也牺牲了。敌人企图再一次铺设桥板，但又一次被我军击退了……这样经过几回较量，敌人的铺桥阴谋始终未能得逞。

拉锯过程中，敌人突然发起了更加强大的火力进攻，原来从南通方向来增援的四三六团两个营也赶到了。由于海界河东段已被我分区九团封死，敌人无法过河，于是向西转到了铁板洋桥与四三八团合力，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强行过桥。

敌人把桥板再次铺上时，已是下午四时，我军接到了撤出战斗的命令。而敌人还未踏上桥板就马上退了回去，原来麒麟镇已经被我八团拿下，慌不择路的敌人赶紧向北逃窜，顾成祖和战友们手中的机枪再一次发挥了威力，走在后面的敌人被打死了几个，敌人边打边退……顾成祖说，当时营长对大家说，让他们多活几天吧，反正他们已经是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！

顾老最后说，这次阻击战，我军在击毙了敌人400多人的同时，我方也有100多人的伤亡，虽然完成了阻击任务，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。

铁板洋桥阻击战后，顾成祖所在的一营受到了苏中四分区首长的表彰。

范公堤上的交汇点——倒埠子

□陈新华

倒埠子，曾是范公堤上通州与如东交界处的繁华枢纽。它位于原五总乡（通州区十总镇五总社区）北陲，确切说它在包公堤与海防新堰的交汇点上，宛如岁月织就的经纬线，将海盐文明的经纬深深织入江海大地的肌理。

明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，海边煎盐地在北宋狄公堤东，分南、中、北三团，共三十总，倒埠子是北十总。在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的地图上，倒埠子的位置被标注为“十总埠”，可以说明，倒埠子这个地名在近100年前的地图上还未出现，是一个近现代的地名。

关于倒埠子地名的来历，众说纷纭。一说是因倒卖卖得名，但因倒埠子所处的地理位置，到明代，特别是清代后，由于海岸线的变迁，它逐渐失去了作为埠子、码头的作用，倒塌废弃，民间可能称其为“倒埠子”。加之此处曾是小型商埠，后因盐业经济衰退和交通路线改变而没落，故名“倒埠子”。

明嘉靖三十年（1551），倒埠子所在地已经上岸。海岸线来到了十八总岸头至骑岸、五总、倒埠子以东一线，距老的狄公堤达10里之遥，狄公堤已失去了捍海的作用。于是，官府决定在狄公堤东北沿海地带构筑新的堤坝。从余西庄（经东社）、金沙（十八总）、西亭（八总洋桥）到石港场（经骑岸、五总、倒埠子），一道新的堤坝拔地而起，这就是海防新堰。海防新堰的筑起，标志着通州各盐场盐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通州分司判官包拯自北边马塘场的彭家缺口筑堤，接倒埠子的海防新堰，将马塘场围在堤内，称“包公堤”。堤底宽3丈，堤顶宽1丈。

海防新堰和包公堤的筑成，让倒埠子成为两条海堤的交接点，后人统称为“范公堤”。倒埠子的历史也从明嘉靖年间开始书写，有了堤坝的守护，堤岸西边的土地不再惧怕海潮的侵袭，盐业继续繁荣。

倒埠子的经济活动丰富多彩。起初，该地因外来移民入驻猎渔煮盐，后陆续散居滩涂海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商人和农民前来交易。南来北往的商贩、车夫、乡民、渔民在这个路口进进出出，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集市。从民国二十五年的地图上看，倒埠子比南边骑岸镇的集镇规模略小一点，超过了五总埠及十总店。这里曾是江淮盐运的神经末梢。

家住倒埠子路口的潘世杰老人，今年89岁高龄，原为南通县政协委员。潘老先生回忆说，旧时，倒埠子房屋两百多间，有店铺20多家，青石板铺的街道500米左右，北眺如东小埠，南望五总市镇。曾经的两家药店、两家杂货店、一家酱油店和一家花行令他记忆深刻。两家药店一家是曹埠苏家开的，一家是本埠人合开的，酱油店是如东孙窑人开的，还有镇江等外地人开的杂货店、茶食店等等。“人宜济世，和养回春”——这是江家药店门口的对联，让他难以忘怀。老一辈人口口相传“先有倒埠，后有五总埠”，倒埠子有早市、晚市，特别是在农历大汛期到来时，挑着海担子过来交易的，每人一个摊位，在街面上一字排开，有50至60米长，银带鱼铺满半条街，刚起的昌娥还带着咸沫子，胜似庙会，热闹非凡。本地人称它为“八仙行”，是倒埠子的一大商业景观。

对于倒埠子的由来，潘老先生回忆说，小时候曾在收花的花行“店截子”上看到过“岛埠子”的字样。他觉得最初的倒埠子是海里的一个岛，四周环水，所以称“岛埠子”。明清时期，倒埠子连接着海堤与总田，是卖鱼湾渔民下海、盐民运盐和商人卖货的重要通道，最初作为一个岛、潮墩存在也是有可能的。对于倒埠子地名的由来已无考，无论是“倒买倒卖”的交易说，或是“埠子倒塌废弃”的崩塌说，还是潘老先生的岛屿说，都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，共同构成了倒埠子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倒埠子不但在范公堤上，也位于古横江遗址的东部，处在南通口音跟如东口音的剧烈碰撞地带，它跟五总渡海亭村、石港北、五窑、刘桥北部一样，形成了独特的“古横江”牌口音。比如，“吃肉”的“肉”字，这边读“ruo”；“家去”（回去）的“去”，这边读“qi”。又比如，吃饭的“吃”这里发音为“肺”。这是南北互通后形成的独特口音。

而今，那些在晨雾中称盐的铜斛、那些在黄昏里唱晚的渔船，都化作老者烟里闪烁的星火。现在的倒埠子路口有饭店、超市、杂货店、电瓶车店、电器店、肉铺、理发店等商业店铺。当现代化的浪潮漫过旧时的堤岸，倒埠子的青石板